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国学论谭

唐朝确立了以德治国的大政方针,这需要有持之以恒的政治信心和耐心,从历史上看,容易出现两方面的问题,第一是最高当政者是否真心实干,而且能不能长期坚持。第二是官员们是否都想得通,怎么排除阻力。

空谈误国

绝大多数的统治者都会讲“以德治国”来博取喝彩。但是,这个口号最容易流于空谈。对于统治者来说,不少人是读过书,发布政令和指导百姓的时候,总是信誓旦旦,把尧舜禹的治国理想说得头头是道,深明大义。但是,为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依然失败呢?

这些统治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,第一类如梁武帝萧衍、梁元帝萧绎父子。第二类如隋文帝、隋炀帝父子。

先说第一类,他们有什么特点呢?四个字:空谈误国。梁武帝萧衍出身于兰陵萧氏,这一门在江南非常显赫,据传是汉朝名相萧何的后代。萧衍自幼聪明绝顶,而且博学多才,和大史学家沈约、大文学家谢朓等人号称“竟陵八友”,是那个时代文化江南的领军人物。可知梁武帝的才学不得了,更高出这八个人一筹的是他胆魄过人。南齐末年政治乱局,梁武帝崛起,开国称帝,建立梁朝,给江南带来了难得的和平安宁、文化繁荣。南方文化可以同北方相抗衡,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。梁武帝在政治上不折腾,不乱整人,崇尚文治,都是优点。但是,他小富即安,特别是晚年沉迷于佛教,大建寺庙,“穷极宏丽,僧尼十余万,资产丰沃”,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。偏安江南的王朝全然忘记了北方大敌当前,陶醉在江南春暖之中,男人涂脂抹粉,世家子弟听到驴叫以为是老虎,吓得抱头鼠窜,个个弱不禁风。梁武帝成天和大臣们谈论佛教道家,探讨宇宙终极道理,奢谈人生理想,把国家大事都放到脑后,仿佛说了就是做了,终于政治矛盾激化,梁武帝好心收留的北方叛将侯景,看穿梁朝是泥塑的菩萨,徒有其表,悍然称兵作乱,把梁武帝困死在都城。

梁武帝死了,他的儿子总应该吸取教训吧。恰恰相反,梁元帝萧绎玄谈的功夫更在乃父之上。“侯景之乱”平定之后,萧绎当了皇帝,这时南方王朝在长江上的战略要地都已经落入北周的控制之中,在这种形势下,谁都会发奋图强,梁元帝当然也大谈文治,还组织百官听讲学习,他亲自讲解,津津有味。一直到北周军队包围都城,枪林箭雨,杀声震天。你知道梁元帝在做什么吗?他若无其事,依然在大殿上讲论《老子》,百官戎服静听,仿佛有大义在此,神明保佑,何惧强敌?后来发生的事情既在意料之中,又出乎意料之外。城自然被攻破了,梁元帝期待的神明没有出现,他彻底绝望了,迁怒于书籍道:“读书万卷,犹有今日。”放一把火,把四万卷收集来的珍贵古今图书十二万卷付之一炬。梁元帝不明白自己宣扬道德,为什么会国破人亡。南朝著名的文人庾信的《哀江南赋》替他做了回答:“幸衡以干戈为儿戏,缙绅以清谈为庙略。”空谈道德便万事大吉,把国务兵事当做儿戏,能不灭亡吗?这是真人版的阿Q群正传,精神胜利法。

作秀败德

第二种类型,是把“以德治国”作为花瓶来点缀,粉饰太平。隋文帝、隋炀帝父子可以说是代表性人

实干兴唐

◆ 韩昇



唐太宗李世民



▲《贞观政要》

物。隋朝税费的征课是最严重的,把老百姓剥削到家无三日粮,连妇女都被征调去服沉重的劳役,开河筑城。但是,我们在隋朝官方文件中见到的是另一种情况。隋文帝在位的时候,多次宣布,因为国库充实,把部分租税赏赐给百姓。这些赋税的减免都被记入史册。隋炀帝在这方面丝毫不比他爹差,他把成丁的年龄大幅度提高,还宣布免除妇女的课役。要知道,贞观八年,唐太宗提高成丁年龄就等于推迟征收收税年龄。这些措施多么动人,以至于后代研究历史的人,将这些记载串起来,觉得隋朝挺宽厚的,是被人抹黑了,为它鸣冤叫屈,甚至歌功颂德。

这其中奥秘在哪里呢?唐太宗一语道破。贞观八年,唐太宗对大臣说道:“隋代老百姓哪怕有财产也是保不住的。”为什么呢?因为朝廷经常在法令规定之外征调赋役,表面上看时不时会有朝廷的赏赐,但是很快又都被征调走了,这一边刚拿到手的东西,另一边就被加倍拿回去,只留下空欢喜一场。这种恩赏还不如不要。原来隋文帝、隋炀帝父子的减税都是在作秀,为自己博取名。

唐太宗有没有刻意抹黑隋朝呢?一笔账、一个事实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。哪一笔账呢?我前文曾说到隋朝国库留到唐朝还能用几十年,按照隋朝的减税措施,这些钱粮难道是隋文帝、隋炀帝变魔术变出来的吗?一个事实是什么呢?隋炀帝时期因为劳动力不足,大量征调妇女服劳役,这在当时人的日记中比比皆是。

显然,隋朝统治者非常善于作秀,把自己粉饰得道貌岸然。这种游戏玩一两次也许可以蒙骗过去,经常做就穿帮了,天下老百姓眼睛都亮着,其结果反而伤了朝廷的本。什么本呢?那就是朝廷的信义,从此朝廷说话没人相信,甚至只能反过来听。一个王朝到了信义破产,离灭亡就不远了。

唐太宗吸取隋朝的教训,极力避免做这类粉饰的事情。他说我自从登基以来,用心养育百姓,没有劳役征发,让民众能够安心生产,守住财产,这就是我的赏赐。不扰民,不

强征暴敛,让老百姓安居乐业,就是朝廷能给予百姓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
所以,治国一不靠小聪明,二不靠作秀,三不靠小恩小惠,四也不靠自吹自擂。唐太宗说得在理,做得怎样呢?贞观初年,北方遭受突厥入侵,乡村受损。主管社会经济的民部尚书裴矩向唐太宗建议,采用按照人口分发物资的办法,真正起到了救济的作用,当然,朝廷的支出也相应增加了不少。老百姓拿到手里的管用,能不对朝廷产生信任感吗?

除了上面说的两种执政者之外,更常见到的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出现的所谓“能吏”,他们对于以德治国的杀伤力一点也不小。什么是“能吏”呢?就是特别能够挖空心思增税加收的官吏,因为他们能够让国家的税收快速大幅度增加,在皇帝眼中,他们显得特别能干,故称“能吏”,而唐史则称他们为“聚敛之臣”,也就是搜刮能手。

能吏丧邦

为什么在古代能吏层出不穷呢?核心问题是古代王朝高度集权,无人能够制约朝廷的开支。花钱没有制约,是多么开心的事情呀,再节俭的人都会变得大手大脚。于是,皇帝大兴土木享受荣华,四处征伐,很快钱就不够用了。朝廷财政有困难之日,便是能吏出现之时。

其奥秘怕是朝廷财政富裕的时候都挡不住能吏的出现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因为官吏是要考核政绩的,税收增长是最明摆不过的政绩,对于负责税收的官员更是如此。在他们眼里,增收就是硬道理,他们只想收税,提出种种收税的学说和办法来,迎合君主,却从来没有想过税收必须确定合理的用途,才构成开征的根据,否则加税只会助长官方不断扩张权力,刺激他们乱做事,乱花钱,甚至腐败。隋朝就是很好的例子,国库用不完,隋炀帝就纵欲妄为,大兴土木,穷兵黩武。乱花钱的

邪门一开,上行下效,再多的钱都不够挥霍。钱不够了只能加税,税多了更加铺张浪费,这就是唐史中一针见血指出的“用于上者无节,而取于下者无限,民竭其力而不能供”,陷入恶性循环之中。

聚敛之臣一旦被重用,效果立马可见,国税大增,君王欢天喜地,又可以尽情挥霍了。可是,没有人去想这样一个问题,社会的财富不会突然激增,为什么税费可以快速增加呢?其实没有什么诀窍,只有一个办法,改变正常的税法制度,不立法便随意开征新税,变换花样,巧立名目,无所不收税,乃至重复收税,先收几十年后的税等等,说白了就是以收税费之名,行抢劫之实。到朝廷中枢充斥着这样一批搜刮能手的时候,说给老百姓减税就反对,或者搬出许多理由来推三阻四,说到加税就来精神,巧立名目,花样百出,到了这时候离动乱就不远了。各朝各代的历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。

中国古代早就发现能吏的危害性,《礼记·大学》甚至说道:“百乘之家,不畜聚敛之臣,与其有聚敛之臣,宁有盗臣。”什么意思呢?就是说国家不能重用专事搜刮的能吏,哪怕用贪污的“盗臣”,都不能用“聚敛之臣”。为什么呢?因为贪污是个人行为,国家损失的是一些钱财,而“聚敛之臣”破坏的是国家的信义和正常的税收制度,法外加征,让国家陷入与民争利的大博弈之中,危害的是整个社会,往往导致王朝灭亡。房玄龄为什么要亲自掌管财政事务,就是为了防止“聚敛之臣”上台。唐太宗时代,没用过一个“聚敛之臣”。

藏富于民作为国策,人事上出现了新的景象,这可以从一件事情上充分反映出来。有位名叫窦静的司农卿,相当于农业部长。那时候的经济以农业为主,所以这个部门非常重要,最能够体现朝廷政策的真实走向。窦静是个主张轻税养民的清官,他的副手赵元楷则是另一种类型,也就是能吏,或者叫做聚敛之臣。正副主官的理念截然相反,这个部门还怎么开展工作呢?别担心,窦静自有办法,他把官员召集训话,以赵元楷为例,说道:“隋炀帝铺张奢侈,所以要拼命敛财,司农卿非你莫属。但是,今日的皇上节俭爱民,你就没有用处了!”说得赵元楷满脸通红,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。从这则故事不难看出,在唐太宗时期,以搜刮赋税为能事的官吏遭人鄙视,百姓能够安心过日子。

唐太宗大幅度减轻税负,朝廷的日子怎么过呢?唐朝主要采取了三个办法,第一是量入制人;第二是厉行节俭,反对奢侈;第三是鼓励民间自立自助。

量入制人

唐朝理财坚持三条原则,那就是“量入之力而授之田,量地之产而取以给公上,量其人而出之以为用度之数”。前两条讲的是发展生产和合理征税,第三条讲的是中国古代国家财政的基本指导思想,那就是要根据财政收入来决定政府开支,有多少用多少,不能无限制挥霍,用收入的盘子来限制支出的规模。这就是“量入制出”的原则。

有些人向西方看齐,说西方现代财政是倒过来的“量入制人”,是先进的财政思想,而中国的“量入制出”则是小农时代的产物,落伍了。好像咱们什么都得仿效西方不可,这是误导。西方有一套限制支出的制度,政府花一分钱都得议会来审批,所以可以采取开支决定收入的模式,中国古代没有人能制约朝廷的开支,所以要用收入来决定开支。说到根本上,这两种模式的内核是相通的,都是为了防止乱收税费。

唐太宗采取的办法是把征税纳入法制框架内,严格管住税后收费。这还有一个好处,就是朝廷能够真正控制住官府收入的总盘子,心中有数,这才谈得上贯彻量入制出的

原则。唐太宗坚决实行减免赋税,朝廷的收入大大减少了,这个家要怎么当呢?

节约开支,反对奢侈

税收少了,就必须厉行节俭,反对奢侈。这一条看起来好做,实际上触动了利益集团,似易实难。唐太宗是难易都做,双管齐下,采取了两个办法。

第一个办法,是比较容易做的,那就是厉行节约。朝廷每做一件事,先要想对老百姓有利否,避免大兴土木,劳民伤财。唐太宗曾经对大臣们讲历史,说大禹开山治水,老百姓没有怨言,而秦始皇修建宫殿,天下起而叛之。同样是大型工程,为什么效果完全两样呢?因为大禹做的利国利民,双赢。秦始皇做的对统治者有利,却伤害了老百姓。吃好穿好,高楼大厦,这些是人人都向往的,但是,如果放纵不管,危亡就在眼前。我打算盖一座宫殿,材料都准备好了,因为看到秦始皇的教训,马上停止了。希望王公以下众臣百官能够体察我心!唐太宗身为表率,在他的带领之下,史书称:“由是二十年,风俗素朴,衣无锦绣,公私富给”。

第二个办法难度就大多了,那就是精兵简政,限制特权。古代王朝渐渐烂掉,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官吏无限制膨胀,特权阶层不断壮大。我们还是说唐朝的例子,在唐太宗勤俭建国方针之下,唐朝生产和纳税人口要多于享受免税的特权阶层,因此,整个社会良性运转,官府和私人都达到富裕。后来控制渐渐松弛了,官越来越多,不但享受各种待遇,而且家属也可以免税,在不知不觉中享受免税特权的竟然大幅度超过纳税人口,国家随之解体。显然,放任腐败是死路一条,而限制特权这条路充满艰难险阻。

唐太宗怎么做呢?首先从自身做起,管住皇族。

唐朝立国之初,唐高祖李渊认为西周之所以维持八百年,是因为实行分封制的功劳。所以,他大封宗室,亲王数十个,连孩童都封王。唐太宗即位后,征询大臣对于分封的意见。封德彝对道:“以前封王仅限于皇子 and 兄弟,此外皇亲必须立下大功才能封王,但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多的。王爵尊贵,待遇优厚,恐怕不公平。”

唐太宗听后,马上表态道:“我当皇帝是为了养育百姓,怎么可以侵扰百姓来养肥皇族呢?”于是下令皇亲王者都连降好几级爵位,待遇也跟着减低,只有立功者除外。

其次,建立精简的中央朝廷。对于朝官,唐太宗指示宰相房玄龄说:“官在得人,不在员多。”选官和买东西一样,必须精挑细拣,不能见便宜就买,最后钱没少花,满屋没有一件值钱的東西。用人也要百里挑一,个个顶用才行。根据唐太宗的指示,房玄龄对中央朝廷的机构和官员进行精简裁并,总共只留下文武官员六百四十三人。唐初全国人口虽少,但也有两千万到三千万人,而朝官只有643人,朝官和总人口的比例之低,在历史上非常突出。然而,唐太宗贞观时代朝廷的效率之高,也是历史上少有的。

为什么官少了反而效率高了呢?隋唐时代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讨论。当时就发现官府做的不少事情是为了官员的政绩,其结果只是扰民。因此,很多王朝三申五令不许官员随便生事。这些命令基本上成一纸空文。为什么呢?哪有官员不做事的?管他做的是什么事,他一旦在位就要生事,禁都禁不住。每个官都做一通政绩,老百姓就连气也喘不过来了。有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呢?有的,当时人总结道:“省事不如省官。”把重叠的机构和冗官裁掉,天下就没有那么多事情了,还节约了许多政府开支。唐太宗其实就是贯彻这个思想,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,君静民安,百姓安居乐业。